

周期性社会动乱在现代中国的基本轮回

——以2019年香港动乱为例——

王元*

The End of 10-Years Cycle of Social Turmoil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ase of 2019 Hong Kong Riots

WANG, Yuan

序言

2019年春在香港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示威游行事件，到年底因为新冠病毒传染开始扩大才渐趋收敛。事件从三月中旬开始，至六月初急剧升级，从最初的示威游行，演变成阻塞公共交通、冲击政法机构等暴力行为。2020年夏季以后美国大选引人注目，加上港版国安法实施力度加大，动乱难以为继。至2020年基本停息为止，这一过程持续了一年有余，漫长而曲折。考虑到2020年以后，动乱的频度和规模都跟2019年有较大的差距，本文暂且把本事件简称为“2019年香港动乱”。

就香港地区而言，2019年动乱是2014年“雨伞革命”的一个延续；从整个国家来讲则是继2008-9年新疆、西藏地区暴动之后时隔10年的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笔者长期观察中国大约10年为周期的社会动乱，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乱贯穿了整个现代中国一百年的历史。2019年香港动乱自然也在观察之列。

这篇研究札记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对2019年香港动乱本身进行详细的分析，而在于探讨这次事件在中国大约10年周期的社会动乱中的地位位置和作用。看

* 东北文化学园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教授

看它跟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10年周期的社会动乱之间的整合性到底如何。

1 事件

2019年香港动乱不是孤立发生的。首先，早在2014年就曾发生过一次持续时间以及参加人数都很可观的“雨伞革命”。其次，从2018年后半，香港的经济出现下滑，2019年第一季度更加恶化。第三，一个香港青年在台湾旅游时冲动性杀死了恋人的事件，成为3月16号由香港“众志”主导的反对所谓的“送中条例”的学生运动的诱因。而这场学生运动又成为整个2019年香港动乱的导火索。第四，每年6月4日为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进行的追悼活动自1989年以后已经到了30周年的重大关键年头。2019年香港动乱正是在在6月9日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第五，香港长期以来的住房难，跟内地（特别是紧邻的广东·深圳）之间的比较和竞争，香港长期保有的各种优势逐渐缩小，这导致了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理失落。第六，香港社会在回归之后积累期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两种体制并存带来的冲突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可见，这次动乱的基础原因和直接诱因多而复杂，它们共同促进了动乱的发生和升级，香港2019年动乱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言论自由的问题是原因中比较表面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可谓是最自由的地区。每年都有得到当局认可的数以百计的示威游行发生。直至动乱前夕，美国对香港人权和言论自由在内的“自治”的评价甚高。¹⁾所谓的“反送中”充其量不过是为了防止可能的威胁。这样一种预防性的动乱，其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与其参与者的预期明显地是背道而驰的。

1.1 北京的隐忍：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2014年雨伞革命

2014年，香港学生也闹了不短一段时间，但是在当局的不予理睬之下，后继乏力，参加人数渐减，逐渐式微。那一次他们准备得不够充分，结果半途而废。而2019年香港的年轻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空前高涨的动乱情绪对香港社会的扩

1) 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2018年对香港自治程度的评价为“充分”，2019年3月21日的评价为“充分，但有所减退”。

散和浸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至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方面，在整个2019年里，其介入动乱的范围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中央政府把应对动乱的职责基本上委托给了香港政府。北京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幕后，这既不是因为对香港动乱心存畏惧，也不是心存同情，而是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留下来的经验教训？虽然事件后中国经历了猛烈的经济增长，当局以此对当时武力镇压性行动加以正当化，但是这次事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留下的伤疤久久难以愈合，在国内变成了一个不看回顾的禁忌。

2019年香港动乱中，北京心中笃定也许是最重要的：虽然香港已经从英国回归了，但是回归后实行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香港跟内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起来。香港动乱对内地的影响是有限的，香港动一动不得大局，“反正坏不到哪里去”，而且北京深知动乱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有了1989年的经验教训，这次中国政府手上有更多的牌，更能客观地观察香港动乱和世界局势，可以一边沉着对应，一边等待合适的切入时机。

基于这些判断，中国政府似乎倾向于2014年那样的放任自流，等待香港社会内部的对动乱的抵抗力量的壮大，因为只要不波及到内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不会太大，而且具有凝聚和稳定国内局势的作用。当局（尤其是中央政府）不急于直接出手镇压。不能排除当局放任动乱，最后出手收拾残局的可能性。

中央政府的这种克制的态度基本上一直贯穿了香港动乱的全过程。但是克制归克制，北京同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方面寻找类似于2014年那样妥协的时机，一方面也在做另一手打算，这就是港版国安法的制定和通过。

缺乏1989年那样的紧迫性，这使北京能够以静制动，按部就班地实施各种措施。直到次年春天，新冠感染急剧扩大，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动乱规模一下子就降了下来。但是即便如此，一直到夏天，动乱仍时有反复。动乱到2020年夏天基本上结束的原因在于(1)世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大选，以及(2)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实施所带来的威慑效果、(3)美国川普政权初期反应过度，后期难以为继，结尾时更是自顾不暇。²⁾趁着美国国内混乱，无暇顾及的大好时机，北京下杀手惩治动乱主导者，终于把这次动乱镇压了下去。北京2019年的一年多的隐忍到2020年夏天终于收获了成果。

跟1989年相比，2019年香港的这次动乱应该说好解决得多。首先，这30年

2) 显而易见，即使川普连任，北京也不会对香港的动乱坐视不管。因为旷日持久的动乱已经开始动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北京无法容忍的。

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人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精英在香港动乱上认同一致。中央权力中枢的集体领导更加制度化，权力斗争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利用动乱攫取权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2 香港作为中国周期性社会动乱的舞台装置

作为中国周期性社会动乱一环的2019年香港动乱只有放在整个国家以及现代史的背景下才能看清楚。1989年天安门事件虽然在中国本土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但是在香港一直是进行中的事件。虽然近年渐趋收敛，1989年天安门的那把火一直在香港延烧，这也令香港每年六四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2019年是30周年大坎，更加令人瞩目。不仅如此，回归后的香港成为围绕中国的各种势力汇聚的磁场。虽然一日日跟内地整合起来，但是“两制”的存在却为各种势力提供了在此共存的可能。北京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也都把香港视为自己的舞台。围绕中国的各种情报在这里交汇，各种势力暗地里勾心斗角。香港成为一个例外之地，成了中国社会动乱的风水宝地。

2019年民众成为香港动乱的主体，但是这一主体性是打折扣的，因为受到了各种外部势力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和台湾的蔡英文体制在这次香港动乱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19年香港动乱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内生的。对充斥着大量强硬反华政客的川普政权以及更加重视意识形态，不掩饰自己对香港动乱的关切的美国国会，香港动乱是天赐良机。

有关香港这一波动乱发生地为的可能性，我和我在中国社会动乱周期性问题上的研究伙伴们是有认识的。例如，黄斌在他2015年的论文中就曾这样指出“在观察最近的香港学生运动等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概念与命题，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脉络。因此，这些周期研究中衍生出来的新概念与新命题，值得我们今后格外予以关注。”³⁾我们都注意到了中国一个社会动乱从中心向边缘发展的趋势。北京退下来以后，上海也难有作为，内地被弄成了铁板一块。在不存在其他合适的舞台装置的情况下，轮到香港出头了。

3) 黄斌「中国政治周期研究概覽」，王元(主編)『研究特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的规律性』第45頁、『Modern China Studies』2015年7月刊。

作为动乱前奏的2014年学潮

2014年的香港学潮之于2019年香港动乱跟1986-7年学潮之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笔者最初涉及本研究的契机就是主要发生在上海、南京、合肥等南方城市的1986-7年学潮。回想起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此后每次动乱都成为笔者仔细观察的对象，这个过程越来越加深了笔者对动乱发生的周期性的认识。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从1986-7年中等规模的学潮发展成为后来的巨大规模的学潮。香港这次也是。其实，类似的例子不少，二者之间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同一性质的。比如文革爆发于1966年，动乱的高潮在1968年到来；2008-9年是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和西藏）的动乱，但是2005年发生的却是内地各地的“反日示威”。⁴⁾

这也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当然不是每次都必然如此。毕竟社会现象的不确定性要远远大于自然现象。不过，总的来讲都跟力量特别是社会压力积累的量有关。一般，上一次大动乱的规模越大，这种中等规模的动乱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变小，相反就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中间发生的中等规模的动乱理论上对下一次大规模动乱的规模也会产生影响。上一次的规模超大的话，接下来的中等规模的动乱就会相应规模小一些，甚至不发生了。这也可以视为社会动力的一种内在平衡。

中等规模的社会动乱发生的时间一般是在反动期和安定期过后，也就是上次动乱发生的大约5-6年之后。1986年的学潮是1976年四五运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到1978年一连串的动荡结束的8年之后，“雨伞革命”是2008-9年少数民族地区动乱的5年之后，2005年“反日示威”是1999年法轮功事件的6年之后。1966年文革发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8年之后。

动与乱

其实，动乱的本质是社会混乱。只不过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混乱的层次低，规模小，所以作为研究对象显得不够分量。笔者编著的《宏观中国政治：以社会变动的周期性为中心》一书中⁵⁾，涉及的都是巨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动乱动乱，一日动，一日乱。自上而下而为动，也就是政治运动。比如文革，反右大跃进，

4) 王元(编)『マクロ中国政治：社会変動の周期性を中心として』第15, 24頁, 白帝社2011年12月刊
【宏观】第41-42頁.

5) 上书第54頁.

镇压反革命等等。相反自下而上则为乱，也就是社会骚乱。（在现代汉语里“动乱”有反政府反体制的意思，这也是现在在国内仍然很难展开研究的原因。）大多数是混合型的，也即动和乱两者皆有。不过，如果细分的话还是可以看出先后和主次。先动后乱与先乱后动会带来迥然不同的结果。

最多的是先是发生骚乱，后来导致政治中枢在对策上意见出现分歧。由于在中国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往往夹杂着权力斗争的因素，动乱的进展愈加复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剧情越来越狗血”。）反右和文革则是先动后乱，毛主席想当然地认为他能够控制大局。反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这一目的（主要是双百运动阶段），但是由于限于知识阶层，社会上更多的阶层的压力并未得到舒缓，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积累的巨大的社会压力，结果以大跃进的方式爆发出来。而文革由于涉及权力斗争，主要是由于反右和大跃进后中共中央的团结被破坏，导致党内各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分歧，最后搞得不可收拾。

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跟政治体制中枢的团结有关。毛泽东时代的团结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它主要是靠毛的威信维持的。不用说当时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各部分之间的契合过程时日尚浅，各种机制比较粗糙，没有形成足够有机的融合（制度化）。

其实，不光是中国，最近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动乱。川普四年美国的乱象跟中国的十年文革有不少相似之处。茶党、另类右翼、Qanon以及2020年大选中出现的众多阴谋集团类似于中国当年的红卫兵，其中的川普类似于造反派，他们派系林立，文攻武卫；而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层在内的建制派则类似于文革时的当权派。

3 2011年的分析：⁶⁾ 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基本轮回

笔者在2011年的《宏观中国政治：以社会变动的周期性为中心》一书中曾经对2008-9年以后动乱的发展倾向进行了六大分析，这就是（1）动乱发生的地点将从中央向地方发展。包括从中心城市向农村等边缘地区，从汉族朝少数

6) 王元(編)『マクロ中国政治：社会變動の周期性を中心として』第74-77頁、白帝社2011年12月刊

民族，进而向全国范围发展的可能性。（2）从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和主流社会朝退休退伍人员等非主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3）动乱规模的从大型朝中小型，从集中爆发朝分散爆发发展的可能性。（4）在动乱发生季节上，从春季朝其他季节，进而朝全年发展，从而失去季节性的可能性。（5）下一次动乱的来临将从2016年开始，持续到2019年为止的期间都属于高发可能期间。（6）如果到2019年都不发生的话，我们就应该考虑这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的寿终正寝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10年前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哪些地方又未能测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特别注意解释那些新出现的现象和因素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动乱史上的意义。

3.1 中央→地方，都市→农村→全国，汉民族→少数民族→全国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周期性社会动乱走过了一个政治体制上从中央→地方，社会结构上从都市→农村→全国，民族上从汉民族→少数民族→全国的过程（道路）。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首先是动乱发生地点的范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里的中央主要是政治经济的重心所在的中心城市。

动乱发生地点是指该次动乱最初始发的场所。即便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动乱，最初大都是由一件“小事”引发的。笔者的研究表明，到19世纪末为止，中国的社会动乱最初大多发生在农村，地点的分布有很大的随机性。估计这主要是跟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导致的现代以前社会体制结构的松散有关，特别是其中政治文化政治意识的部分。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前半大多是一个中心城市首发，然后再扩散到别的城市进而再发展到全国范围。尽管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真正整合起来，但是国难当头之下，精英阶层的忧患意识已经发生了质变。这一变化是一个不断向下渗透的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20世纪后半发生的中小规模的社会动乱的发生地常常会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发生地集中在中心城市却是必然的。这一切都表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动乱具有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全国性（举国性）的象征意义。口号是抽象的，目标是超越的，过程则具有舞台演出的性质。

不过，并不是全国各地都可能成为这个始发地点。这是因为始发地点往往是被选择成为首发地点的。这就是所谓的“舞台装置”。在整个20世纪，这个

舞台一直是北京；后来开始了一个离开北京的过程，现在2019年的香港可以说是最符合后天安门时代的“舞台装置”这一标准的地点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又有可以容纳百万人聚会的天安门广场，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有号称价值百万美元的维多利亚港湾的夜景。

始发地点逐渐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这表明中国的“热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这又代表了中国国家整体的统治体制的制度化上了一个关键的台阶。当然就民族性而言，这次2019年香港动乱而言是又回到了汉族。香港人以汉族为主，香港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在过去的10多年里逐渐滋生出了中国疆独、藏独和台独之外的港独。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是中国社会文化上的少数地区。

那么再接下来会怎样呢？如果不是(1)向境外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是(2)转换为别的方式，当然也不能排除(3)彻底消失的可能性。境外是指现在中国的行政管辖权力没有直接统治的地区，比如(1)台湾地区、(2)美国、(3)中国以外的包括南亚在内的大东亚地区。这些都是可能发挥较强替代效果的地区，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代替效果达不到同等层次，对本研究对象的意义不大。动乱替代效果地区逐渐向边缘和外缘转移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别的方式可能会包括转化为经济问题和战争问题。其实，(3)的彻底消失也是向别的方式的一种转换，有可能它们都会以中美之间的竞争为内容。

这一过程所显示出来的规律性是很值得玩味的，首先是在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层面。吴国光所关注的中央政权内的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止就已经基本结束了。⁷⁾随着集体领导体制的不断地制度化，中央权力的结构越来越洗练，权力斗争越来越规范化了。这一点在解决薄熙来事件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政变性质的权力斗争越来越难以成功，靠腐败攫取权力也越来越得不偿失。人性好斗，什么地方都有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永远也不会结束。但是我们看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权中央的权力斗争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导致中国的政治危机，更不一定就意味着国家（中央政权）的崩溃。

这不仅是政体形式上，而且本质上的社会性不满问题的解决也有了质的进

7) Wu Guoguang, *Protests against Prosperity: The Recurring Chinese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s. Political Discontent*, 王元 (主编) 『研究特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的规律性』第47-71頁、『Modern China Studies』2015年7月刊。

步。目前主动自动站在当局一边的国民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更多地是价值观上的认识问题。虽然思想已经解放，诅咒已经解除，但仍有部分认识没有转变过来。人在生活中必然要碰到各种冲突，所谓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但是这部分不满，看上去激进，在真正动乱来临，在自己至今为止的生活面临崩溃时，是很容易就转变为保守派的。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制度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

上述的巨大转变跟全能主义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有密切的关系。

全能主义是一个为高速的政治经济发展而设计出来的社会现代化战略，原本是19世纪后半世界各国流行的一种发展战略。其要点是最大可能地利用科学技术和知识理性的力量，最大可能地进行社会动员使全体国民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上则采用倾斜式发展方式，全面调度，发挥整体的力量，有计划地建设国民经济体系，有步骤地迅速提高人民升水平。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采用过这种发展方式，也都曾以不同的程度得到过阶段性的成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国家最终把这条路走出来过。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走上了法西斯化。这是一种国家体制的癌变，给世界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此同时，同一时期的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全能主义相形见绌。全能主义之所以始终难以成功，美国也是一个原因。在世界体系尚未一体化之前的话，二者互不关联，或许都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是在一个日益封闭的世界体系内，它们必然地成为了比较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

美国是一个奇迹，一个很难为很多国家模仿的奇迹，但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却让很多国家不得不模仿美国。美国成了旧的发展方式的终结者，但同时也把自己逼上了原教旨主义民主政治的悬崖。孤悬欧亚大陆之外的美洲大岛上的美利坚合众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异化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一个超级怪胎。

在中国，全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本性的专制主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结果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全能主义的道路。这说明中国跟全能主义有很高的契合。1980年代以后，已经从设计阶段完全过渡到了制度化的阶段，经过此后30多年的进化，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进化出来的体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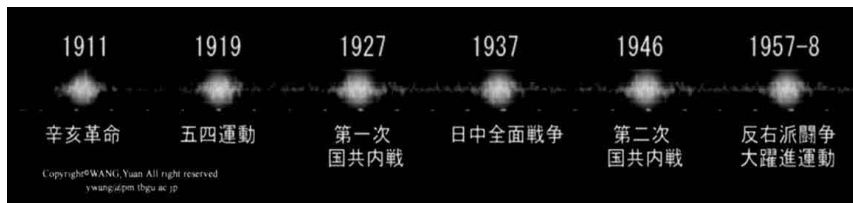
中国的全能主义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利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利的世界秩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全能主义之所以具有一部分极权主义的成分，是因为极权主义是全能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全能主义的民主化变异。极权主义的本质在于，极权主义实际上兼具全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特征，它是一种全能主义在民主化过程中的癌变现象。目标是全能主义，手段却是民主化（民粹主义），结果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民粹性质决定了它的排外指向和非生产性；它的侵略性和规模又决定了它的短命。从这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变异的政体，不如说是一种时局，一种政局。⁸⁾

不能把中国的全能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残存。二者之间的差别，具体地说，首先，全能主义中民粹主义的浓度比较低。在中国，这主要跟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的要求一向较高有关。直接民主，帮派政治等等所谓的竞争民主政治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认可。其次，中国政治文化的外向性较弱。巨大的规模决定中国吃夜草吃不肥，能够让中等国家暴富的横财对中国是杯水车薪。纵观以革命和战争为特征的20世纪，对外战争解决不了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大多是革命而非战争，即便是战争也多是内战和以征服占领为特征的冲突型战争。而国家向上发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有足够的空间来消解内部压力，并在经济上形成内在的新边疆来进行国内的大循环，这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阶梯型发展模式。

把全能主义跟极权主义以及日本的1940年体制进行一些比较是有必要的。一方面中国的这些“成分”只是一部分而已，始终远远未能达到日本1940年体制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使它从一开始就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更确切地说，是大正民主那样的民主化运动无法在中国取得国家层面的成功，从而也难

图1 过去一百多年现代中国发生的周期性社会动乱



8) 其实，限于政府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川普的这四年跟极权主义颇有类似之处，川普四年跟文革十年有得一比。

以把中国引领到极权主义的道路上去。（如果以中国为正统参照系的话，应该说是日本走上了不同的方向。）这种区别是本质的，文革十年的一些做法只是形式上接近，但并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巨大的体量决定她的全能主义化不是一件容易事，必然是一个反复曲折，走很多弯路，花费很多时间的过程。但是如今这条路可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站，面临最后的终点了。

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的，全能主义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由于采取了倾斜式的发展模式，阶段性，主次分明。全能主义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就成为一种毒素（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积累起来，定期发作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才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此后开始享受这一巨大红利。实际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仍在发展之中。虽然毒素被逼出了机体的主干，但并未完全排出机体。不过，建成之前和之后的差别是巨大的。1990年代以后不断完善，现在那种所谓的毒素本身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便是2019年香港动乱中，内地始终没有反应的根本原因。北京希望2019年也能像2014年那样不了了之。美国川普政权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特别是新冠病毒和大选把川普搞得焦头烂额，更多的只是口头上声援而已。而台湾民进党政权就不同了，蔡英文进入第二届任期以后，已经稳住阵脚，在这次香港动乱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2 从社会阶层来看，也从主流社会→非主流社会

首先需要对这里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做一个解释，这主要是鉴于政见表达的通畅性而言的。而且特别是事关社会动乱方面的政见。因此首先是知识阶层，社会的精英阶层。依照这种标准看的话，1989年以后2019年为止的这30年里，动乱的爆发呈现出“主流社会→非主流社会转换”的特征。



出处：笔者自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跟198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巨大成长有关。农民有了土地（国有土地的半永久使用权），市民有了房子等财产，大多数的社会阶层生活已经实现了小康，中产阶级不希望经济下行，更不愿意看到社会发生巨大的动荡。他们仍然有很多不满，时时抱怨，有时甚至会相当激进。但是一旦社会面临动乱，他们就会暴露出保守的一面，支持当局的各种举措。这一点在香港的成年阶层也是如此，结果就导致老一代跟年青一代跟之间的巨大代沟。

主流社会基本上已经得到满足，来自主流社会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不满不再因解决不了而变成社会压力，或已经难以积累到爆发的程度了。

至于2019年香港动乱？因为处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边缘，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次主导的社会阶层界定为“非主流地区的主流阶层”。实际上香港已经闹了一年多，内地的精英阶层始终无动于衷，而且越来越冷淡。有鉴于此，我们原来的分析基本上是准确的。在整个国家的层次上看的话，的确如此。

对于生活水平正在急剧改善过程中的广大中国民众，抽象的民主主义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至于精英层，中国至少在1989年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只是在知识和意识层面，行动上不经过一次彻底的自我否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的1989年3月的那篇〈政治民主与民主政治〉就是一例。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知易行难，只有到了后天安门时代，有些事情才好做了一些。

特别是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确，今天仍然不停地有一些被称为“公知”的知识分子跳出来攻击现政权的各项政策，但一方面人数有限，另一方面大多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个人是问题。无论今后如何，中国社会总会有一定量的不同意见者出现。这大可放在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去加以理解。彭佩奥最近鼓捣什么把中国人民跟中国政治体制区分对待，这个如意算盘恐怕是打错了。当然那也不过是受到了中国某些不同政见者的影响而已。1980年代出国的他们对中国的全能主义缺乏思考和理解。

3.3 大型→中小型 春季→四季均可

以下，我们把第三和第四两个预测并在一起来看。这两点实际上显示出，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中国人的利益和情感关注也多元化了。中国人走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的束缚，开始关注自身以及自身周边的切实的问题的解决。这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背后是，在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大问题”得到了基本

的解决。这是前提。当然，这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其间也曾经历了不少曲折和挫折。而且动乱中小型化了以后的问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从大型朝中小型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社会压力和紧张导致产生的动乱动力的减弱，实际上在1990年代以后已经开始减弱，典型的动乱机制和动乱能量的积蓄已经支撑不起一场超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了。这一点可以从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以及2008-9年的少数民族地区动乱看得很清楚。

从集中于春季向一年四季的转变的一个原因可能还跟网络的发达有关。网络的同时·多发·随机等性质促进了动乱意识的碎片化从而增加了动乱的偶发性。

而且这一点还可以分开来看，一是动乱口号目标的变化，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抽象性口号越来越少了，对社会全阶层的诉求减少，对某些社会阶层特化固化定点化了。这样无法引起更为广泛的兴趣和支持，动员的范围缩小了。尽管动员的深度的加大对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主要是时间性的，也就是把动乱长期延续下去的一种力量，但是对以人数为主的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

20世纪中国大学生等青年知识分子曾经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的强烈的本质因为它是一种忧患意识，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大学入学率的急剧上升使大学生的精英意识不可避免地减退了。这种情况在整个东亚都能观察到，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后高速成长长期社会的普遍特征。⁹⁾ 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此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动乱关联的社会阶层急剧缩小。

其实，口号的变化也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对抽象的民主自由什么的不感兴趣的人一直在减少。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实际起来了，把这些抽象的口号挂在嘴边的往往是一些边缘的地区和阶层。知道应该现实一些才能真正获得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是中国社会的成熟和进步。对少数人权利要求的重视不足是全能主义的缺陷之一，有待于今后的改善。

9) 不过这一点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在日本它表现为一种大学生政治青春期的草食化倾向。但是，美国欧洲等更早发达起来的国家地区的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已经复活了。另外，泰国和台湾的事例也值得注意。这些似乎都意味着一个政治分析中的“象鼻曲线”。这些跟社会差距的扩大之间似乎也存在某种关联。

3.3.1 代替效果与屏蔽作用

至于为何会如此，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动乱不见了以后，中小规模的动乱变得引人注目了。二是，更根本地，某些被巨大规模的动乱掩盖起来的中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显现了出来。这或许跟我以前提到的“替代功能”有关。这种功能显示不同类型（性质）的动乱在解消社会压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能。也就是说A性质的动乱把B性质的动乱的动力屏蔽以后会导致B性质的动乱的规模发生变化，甚至根本就发生不起来。这也是我把不同性质的社会动乱放在一起分析的原因。不同的社会动乱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社会功能的，它们都具有消解社会压力的功能。很多对本研究不能接受的学者就是卡在这一点上。

各种规模和不同性质的动乱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可以流通的内部流通性，说实在的，这一点非常奇妙，我最初观察到这一点时也是百思不解的。有些学者认为，怎么可以把对自由民主这么高尚的追求跟那些具体的甚至是低级不入流的追求同日而语。其实，我也不认为它们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在消解或消化社会压力方面的确是有相通之处的。这里也是我研究的一个底线。

笔者对典型的周期性社会动乱之所以多发生于春天进行过很多叙述，要点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的学期（学制）以及北方中国（特别是作为动力中心舞台的北京）的季节特征导致春季人们情绪不稳定，容易激动（冲动）。而且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其实这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获得的一个新的特征，历史上的社会动乱更多地是发生在秋后（算账）。这似乎只是原因之一而非全部。社会科学在原因的分层上不得不够好，经济学走在了前头。

导致如此的直接原因是大学生的非政治化。而这一点不仅只是中国的特征，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地方。比如日本，日本到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为止社会动乱此起彼伏，但是1970年代以后就很少发生了。广泛的社会不满是大学生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同样，社会不满的减少也会导致大学生的非政治化。这里还涉及到了我采用的另一个概念 思政期（政治思春期）和对动乱的逆反心理。

既然社会不满仍然存在，又无法聚汇起来爆发，那么中小规模动乱的群生多发就是自然而然了。

中国需要尽早建成一个可以涵盖全社会的动乱预警机制。

3.4 下一次的浪潮或许会从2016年开始，2019年迎来高潮？

看来我们的这一个预测是成功了。前曾经提到，在香港，2014年就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社会动乱，即所谓的“雨伞革命”。2019年动乱所要达到的目标，使用的手段，包括口号旗帜，等等，大多在2014年动乱就已经提出来了。2014比2016早了2年，不过，这也在误差范围之内，因为我们最初的预测中就包含了两年的伸缩性，2-3年的反动期以后是3-4年的安静期（稳定期），所以最短在上次动乱结束5年后，下一次的动乱的苗头会出现。只不过由于社会压力尚未普遍积累到大爆发的高度，真正的“巨浪”还是要等到2019年了。

不过我更趋向于认为香港2014年的那次中等规模的社会动乱应该当做1986年学潮来分析，也就是作为更大规模动乱的一个序曲来分析。

2014年是在2008-9年少数民族地区骚乱的5年后。5年虽然仍在我预想的范围内，但是基本上处于下限的位置上。因此，香港的动乱是有其不同寻常之处的。笔者估计这主要跟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有关。毕竟处于体制空间的最外边缘，尽管不一定因此就是统治最薄弱之处，但是天高皇帝远是在所难免的。北京在香港动乱上相对不那么急于求成。

首先，上次2008-9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动乱在发散香港地区的社会压力和缓解其社会紧张的效果不会很明显。毕竟隔了一层关系。但是对香港的本土意识以及大学生的刺激却反而因此而增大了。其次，香港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专门针对对2008-9年民族地区动乱的逆反心理。第三，2014年的参加者（其实2019年也同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幼年化。有些15、16岁的高中生甚至成了学生领袖，并且还一直持续到2019年动乱。在一个平均寿命增加，青少年成熟期不断推后的今天，这么小的年龄政治上的“早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笔者一直用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这次能否成立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异常。1989年等历史上的历届学潮中这一特征并不明显，当年大学三年级学生成为领袖，一、二年级学生是主力。只有文革才可以看到类似香港的这种早熟的情况。香港严重的代沟的存在对此有促进作用，网络的存在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而且，我个人以为2019年事件中途也曾经存在过类似2014年那样的妥协的可能，尽管似乎不是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结不在当局的意料之外，但也不在当局的意愿之内，而是当初几种可以预见的结果之一。

那么，2019年事件今后会怎样呢？2020年的香港的动乱水平会持续低落，

随着各种对策进一步到位，动乱水平会处于一种低位推移的状态，偶尔在各种因缘际会时有所扩大。比如内地发生某种动乱时作为响应的話，规模会扩大一些。但是，就2019年已经发生的情形来看，内外呼应完全没有发生，因此2020年以及此后发生这种呼应的可能性也不大。

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香港的这次动乱我个人认为会是一种加长了的M。也就是说会有几波，会比以前的历次长期持续下去，但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单只香港一地的动力不足以维持2019年那样高强度的动乱水平。其实，任何一个有限的地域的人类社会本来都不具有把此类运动一直维持下去的力量。

今后将会完全消失？逐渐回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动乱。一种不再基于全能主义特征的社会动乱。当然这还需要一些时间，是一个逐步消失的，最近似乎正在加速进行的过程。

从政治学上来讲，20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特殊的世纪；而社会学上来讲的话，这个特殊的阶段可能要把19世纪的大部分也包括进来。但是，中国在21世纪将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这种正常的状况应该如何界定呢？(1)首先是地球仪上基于地形的最根本的空间的自然状况，(2)其次则是基于人的活动的历史时间的状况，比如种族·民族和经济及社会生活，(3)第三还包括文化精神意识心理方面的状况。也就是全世界都基于各地区的上述三种基础条件达成各自发展的状况和程度。而过去的一两百年是不符合这些基础条件的。以前我们经常说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人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其实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出现了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违反自然的状况。现在世界进入了个回归天道自然的进程。

整十周年效应

	2	3	4	5	6	7	8	9	10	1
1900年代										
1910年代								1919		1911
1920年代						1927				
1930年代						1937				
1940年代					1946					
1950年代						1957	1958			
1960年代					1966					
1970年代					1976					
1980年代								1989		
1990年代								1999		
2000年代							2008	2009		
2010年代								2019		
	安全期間				危険期間					

出处：王元《宏观中国政治：以社会变动的周期性为中心》白帝社2011年，第75页。增加了2019年香港动乱。

3.5 如果到2019年仍然不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话，我们有必要考虑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的可能性

这一点，我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如果到2019年没有发生的话，就应该考虑周期性社会动乱完全终结的可能性了。其实，在笔者看来1989年以后，典型的周期性社会动乱就已经结束了。¹⁰⁾ 那以后的两次，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和2008-9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是非典型的，是受到了整十周年效应的影响发生的。法轮功事件虽无前例，但是对整十周年效应的理解不应机械化。这一效应并非单线性的，而是具有浸润性的，也就是说有很大的波及性。动乱基本上是一种发泄，乱本身是一个轮回和因果关系，并不在乎是哪种性质的。因为这里的性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口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借口而已。

因此这一假设认为，虽然典型的周期性社会动乱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整十周年效应的影响，周期性社会动乱仍然在继续。2019年的香港事件作为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事件来看的话，自然同样遵循十年周期的规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比1999年和2008-9年更加符合各种条件，如青年大学生的参与，自由民主等抽象口号的使用。

不过，应该看到，香港还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无法完全放在上述范围内考察的一面。

处于中国政治体制最外层的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它的司法几乎完全控制在非中国国籍的法律专门家手里。而且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看的话，香港比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区别更大。¹¹⁾

香港动乱的新现象。一个是作为虚拟时代的产物，通讯手段比以往历届动乱都远为发达。香港大学生把民主女神拖上狮子山上供奉的情景，配上音乐在网上传播的那种自娱自乐的方式，让我想起了六四以后大学生们游山玩水，寄情山水，山水唱和“打倒李鹏”，“打倒赵紫阳”¹²⁾。反响回应。不过，香港动乱中表现出来的年轻人的娱乐倾向更有甚之，如果硬要比较的话，或许跟文革时期有些类似？

10) 前书，第25-7页。

11) 王威海在中文大学和港大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访问过台湾，据他讲台湾人的思维方式比香港更加中国方式。我自己曾两次去去过香港，对香港跟内地的“不一样”也有同样的认识。香港回归中国时实行“一国两制”有其必然性。

12) 大学生们没有想到赵紫阳后来成了他们的替罪羔羊，被引咎下台，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笑话。

那么，香港的事件发生后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呢？

第一，这一假设又被延长了10年。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到2029年没有发生的话，就应该考虑周期性社会动乱完全终结的可能性了。”

第二，香港的动乱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发生的。我们看到，香港跟本土是分开治理的，而且动乱对本土没有产生波及效果。如果考虑到这些话，我们似乎可以说：“由于到2019年本土没有发生，周期性社会动乱有可能在本土已经完全终结了。”

第三，上述二者之间，笔者倾向于第二。香港跟本土的完全一体化还剩下27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即便“一国”今后会不断加强，“两国”今后仍将会长期存在，我个人预测，甚至到那以后，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持（比如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我不认为现代中国的周期性社会动乱会持续到那个时候仍不结束。

小结：强制性的后发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现在已经进入了成果的保卫战时期。全能主义所带来的宿命性毒素，也即倾斜式发展的副作用的产生开始得到抑制。香港动乱期间，国内风平浪静就是证据。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内地的什么响应，如果说有反响的话也都是反对的声音。实际上除了台湾和美国华人有反应以外，其他各国的华人都表现得很冷静。以前国家组织了一批五毛对反对派进行攻击。但是这次香港动乱期间，国内对一些“吃里扒外的家伙”的抨击和排斥，现在大多不是被动员的，而是自觉地自发地表现出来的。不过显然其中有些是过分了一些。

颜色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香港动乱不可能止于香港，在港府做出让步以后，动乱的脚步却停不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丧失已经可能得到的让步。这恐怕也是动乱的主导者所始料未及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1989年的教训，更因为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信的形成，中国对“民主化·颜色革命”的社会免疫已经基本形成了。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成果，整治各种副作用特别是阶段性腐败和环境污染，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功能性的动荡，其中经济性的动乱的可能性最大。

3.5.1 关于长期化这一特征

我文中经常提到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到底是指什么？它们分别是多长的期间呢？基本上“短期”是指10-20年的一个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期的时间段，“中期”是指30-40年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时间段；“长期”则是指50年以上的一个基本上我们难以预期的时间段。一百年这样更长的时期就可以称为“超长期”了。这一分期参考了经济学上的一些做法，但本质上是我比较随意做出来的，为了我研究的方便做出来的。

长期化这一特征的形成预示着各方面使出的力量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不是各方面的力量而是各方面使用的力量。各方面经过多次较量以后，各自找到了它们的地位和位置，互相之间关系。这有可能会是一种加长了的稳定期间。

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固本土的策略。首先要防止对内地的波及，只有内地稳定了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解决香港的问题。天高皇帝远也使得中国能够这样做，而外国势力的压力又使中国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有“两国”在，当局只能尽可能把事态拖后，一边拖，一边准备“国安法”。这一切看来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2019年底年初开始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扩散似乎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新的攻防会继续在各个层面上展开，但是焦点有可能会转移到台湾。由于台湾仍然没有被纳入中国统治体制之内，这种攻防在短时期内难以见出分晓，因此会形成一种缓慢的推移状态。

4 结论

所有上述的一切都意味着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周期性社会动乱基本上已经扩张到了它的极限。因此，有必要考虑是否已经完全终结的问题。

关于周期性社会动乱的分析到了关键的时刻。迄今为止，笔者已经数次提到基本上可以考虑周期性社会动乱的完全终结的问题了这一点。主要是在1999年以后，鉴于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中，周期性社会动乱的几个基本特征已经消失了的現象，笔者第一次提到了这一问题。书和演讲中都这样提过。2008和2009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骚乱）再一次加深了笔者的这一印象和猜测。各种从前没有显现出来的特征现在都凸现出来。作为历史来研究的现实性大大

提高了。

我们的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预测而进行的。固然，周期性社会动乱呈现出的一定的可预见性增添了本研究的趣味性。但是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不能为了追求趣味性而忘了本研究的学术性。

那么，周期性社会动乱在中国的完全终结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从正面来说，**中国社会将日益稳定繁荣。**

因为这意味着的并不仅仅只是周期性社会动乱的终结，还同时预示着大部分动乱本身水平程度的降低。周期性社会动乱在中国的完全终结的背后是，因为中国社会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到1989年为止）以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已经呈现为一个全新的样貌。基础性的社会紧张大大缓解，社会欲求的现实化进一步发展，社会越来越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压力导致的社会紧张已经出现了大幅的降低，已经不足以支持大约10年的周期性社会动乱了。

虽然经济增长已经过了高峰期，但是得益于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有效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稳定的社会状况，经济增长将会在一定时期维持在一个中等水平的速度上。这是一个难得的中速。有这样的速率（5%左右），中国的经济可以避免失速掉进中等发展国家陷阱，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掉进去也比较容易爬出来。

其实，避免掉进中等发展国家陷阱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升级。中国已经有完整的科研体制，以大学和中科院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球体系中也逐步占据了不错的位置。在QS和THE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世界TOP100的大学中，中国的大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给我们带来底气，支撑我们的自信。假以时日，中国人自然也会迎来诺贝尔奖丰收的季节。

而且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更加扎实，比部分发达国家都更实在。这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维持和继续优化提供了保障。我在中日两国的教育界都有深切体验和观察。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跟日本相比，各有千秋，基本上整体水平在同一个量级上。中国在产品的精细度上仍然有待进一步琢磨。中国的茶和点心比日本差了一大截，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不思进取的原因。

直接的结果是中国将会在20年内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中国或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当然这一时期也不会万事大吉，

动乱仍将会时不时地发生，但是稳定和繁荣将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

第二，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与社会动乱无缘。

一直以来，笔者将动乱的原因跟动乱呈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分开来分析。现在，在分析临近终结时，这一分法仍然有必要。因此，首先，我们需要分析动乱的原因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状态。我们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果使得中国社会动乱的原因大大减低了。一个是巨大进步面前，社会不满的产生大大减少，内容也有所改善。二是社会内部阻止动乱的内在动力大大增强了。这意味着，即使动乱发生也难以升级到从前那样巨大的规模了。

但是，显而易见，原因本身并未消失，有些方面还有所恶化。具体来讲，水涨船高，而且国际环境正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红利现在已经转变为赤字了。现在，对美国而言，中国已经不是被拉拢的对象，而是被怀疑、猜测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以及围追堵截的对象了。特别是进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反华迅速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中心。

在国内，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策运营的抵抗势力。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必然倾向。这有利于中短期的社会稳定，但长此以往并非好事。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期及此后的巨大问题。

第三，动乱的间隔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也有可能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周期性的原因现在的情形。跟动乱因素的减少相比，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周期性的原因变化不大。巨大的变化发生在1989年以后，当时发生了不少人都曾预料的“可以保证20年的稳定发展”的现象。其实，不止20年，实际上到现在已经30年了。也就是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到这次香港的事件为止，在中国，颜色革命已经30年没有发生了。中国人走出国门以后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真实，从前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业已破灭，对祖国的信心大大增大了。一年有过亿国人出国旅游！出去看看也不过如此。中国式民主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对自己的民本主义政治理想和政治体制的信心大大上升了。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最低。

既然动乱的原因并未完全去除，那么动乱就必然会发生。

我一贯认为，中国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我们迄今为止的各种分析以及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的各种预防战略策略都将全部或部分失效。动乱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料。但是，只要不是颜色革命性质的，中国都不怕。动乱在中国社会中的浸润性大大下降，大多限于局部地区和阶层，向其他阶层和领域

的转移越来越少。这次香港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只要国内不动，国际上闹得再欢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对策手法上逐渐得心应手，比较娴熟了。但是怕就怕掉以轻心，摔一个大跟头也未可知。

今后即便周期性以某种形式得到延续，但是很明显，社会动乱的内容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国家的整体也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四，笔者构筑的那一套分析概念和体系将不再适用，已经到了另起炉灶探讨新的分析手段的时候了？

不是说今后社会动乱不再发生了，而是说，在现今的历史时期内，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全能主义的毒素（倾斜式发展的副作用）被驱赶到了体质的外围边缘，现在更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动乱，今后已经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枢难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了。

2021年1月1日

附录1 香港的乱象

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断攀高的香港GDP

香港的人均GDP经过1996～2004年超越停滞期以后，顺利增长，2014年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这些骄人的成绩要看跟谁比，实际上香港的成長速度只比发达经济体稍高一些，跟发达国家中较慢的日本比的话或许值得骄傲，但跟中国内地比就逊色不少了。（图1）

香港年轻人的比较对象更多的是中国内地，而这样一比的话，就相形见绌了。

香港虽然成功地渡过了「1997年回归」和「2007年雷曼危機」，但是香港GDP的增长速度逐步低落，雷曼后一直是3%左右。

不仅如此，实际上香港GDP的增长速度处于不断低下的尴尬境地。（图2）

图1 人均GDP的推移：香港与日本的比较（198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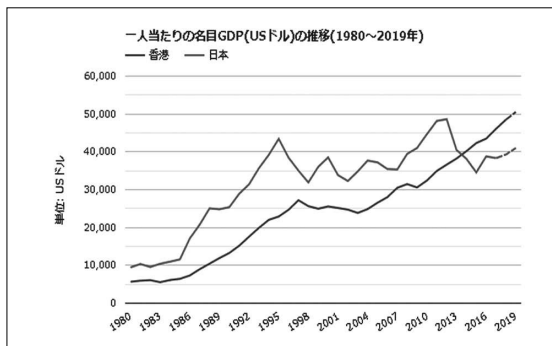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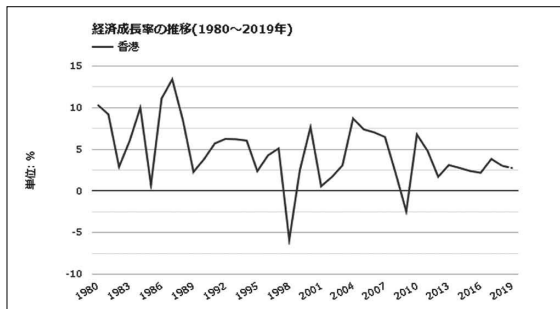


图2 香港的GDP增长率（1980-2019）



出处：根据「世界経済のネタ帳 (<https://ecodb.net/country/HK/>)」作成

贫困率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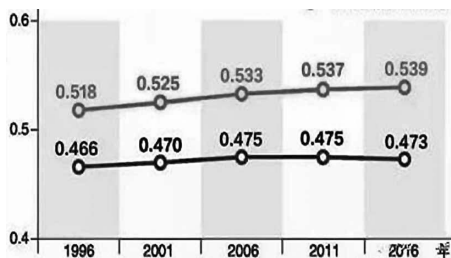
年轻人对未来不抱信心的原因之一是香港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经济上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香港的GDP集中在富裕层里。从前十大富翁在GDP的占有率看的话，中国1.4%、印度5.2%、俄罗斯8.8%。香港35%！

香港是世界上寡头资本主义的一大顶点。大批的亿万富翁和大量的贫困阶层同时产生。富者巨富，贫者极贫。从2018年1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资料可以看出，香港的72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01万人，贫困率高达14.7%，居世界第12位。

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也是香港社会动乱的一个基础因素。2017年，香港基尼系数为0.539。（图3）

图3 过去20年里香港基尼系数的变化



出典：IMF資料。

世界之最的香港房地产

香港房地产的价格为世界第一、房地产发家的富豪的资产也是世界第一。前20位的富豪中、12人房地产王。总资产为1190亿\$、跟二、三位的美国（13人780亿\$）中（4人500亿\$）TOP17人的总资产差不多。香港前50位富豪中、24人是房地产王。年龄最年轻的为54岁、最高龄为93岁、平均70岁。他们在1997年回归前大量圈地土地，此后不断吸收了膨大的土地红利。

香港的激进层从反英过渡到了反中

香港的激进层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反英向反中的过渡。香港大学2012年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¹³⁾“对回归成为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为37%。这一比率比2009年北京奥运会时下降了13%。另一方面，“不感到骄傲”的比2008年高了10%，达58%。2020年6月上旬的舆论调查：18～29岁的年轻人中高达8成自

13) http://blog.livedoor.jp/akashic__records/archives/10681101.html?link_prev=1

认为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¹⁴⁾

深刻的代沟的存在。新急进层实现了跳跃性发展。他们的思想意识跟本土之间相形渐远。

新的形式与形势

其实，两地人民之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屡屡出现了不协和的现象。其中对香港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有几个，一个是出版印刷贩卖小道消息的书店经营者，这就是所谓的送中。另一个是内地一些有头脸的人物对香港社会的现状以及香港人的激烈批判，比如孔祥东。孔祥东的言论代表了内地一部分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香港的殖民地文化极端痛恨，姿态居高临下，趾高气扬，言辞也非常激烈。这些对香港的年轻人以及大多的社会阶层都形成了的普遍而极大的刺激。

香港的学运领袖很难说代表了香港的主体民意，但是毫无疑问这次动乱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香港跟内地之间在人民往来交流层次上也出了不小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今后加以细心调治。

废青=愤青+啃老族

“废青”即“废物青年”，是一个带有歧视含义的贬义词，属于较早的“愤青（愤怒的青年）”的同源词，主要被香港动乱的反对势力用来攻击动乱参加者，笔者未见于2019年以前。

从2014年到2019年香港动乱的参加主体被认为是那些从初高中到大学年轻人的年轻人，有年龄比以往历次动乱都要小的特征。“废青”特别是指动乱参加者中年龄较幼，热衷网络，无独立生活能力，黑色服装、黑口罩、头盔，瘦小身影，容易被动员上街打砸烧的那部分无业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青”大约相当于“愤青”跟后来的“啃老族”二者的相加。香港教育的两极分化导致初高中这一年龄层的青少年有深刻的心理焦虑。

14) <https://www.esquire.com/jp/culture/column/a33228644/china-has-introduced-a-new-national-security-law-for-hong-kong/>

附录2 社会动乱在世界上的流传和共振的形成

超越国境的动乱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动乱，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方面，一是各国各自的问题造成的各种不同的动乱。这些动乱千差万别，互相之间本来也没有关联。但是由于全球化的程度日渐加深，区域化统合，国际秩序，国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互相影响的形势。

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对此有两个很不同的视角，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这些国家通常称自己为民主国家或自由国家，以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它们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颜色革命归结于独裁暴政招致的民众的反抗。它们主张对其中具有西方指向的那部分大力支持，期待颜色变化后成为新的民主国家，成为自己同盟的一部分。另一个视角是受到颜色革命威胁的国家，这些国家认为颜色革命主要是由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上的保守的国家势力主导的旨在针对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国家的阴谋。特别是美国CIA、五眼联盟被认为是幕后黑手。目的通常是为了给这些不听话的国家制造混乱，甚至于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插手别国内政，干涉别国主权，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这一方面本来就有一定的周期性。

但是，由于不具备高等教育的周期性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周期性尚未形成地球规模的共振，这种周期性目前主要来自动乱发力者所具有的周期性，一是需要定期打压，二是其内部政治周期的存在，比如美国政局变动的周期性。通常是美国因两大政党政权更替造成的外交战略策略的周期性。对外部的敏感性出现时间上的起伏。这一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外因。由外部力量控制，视对发力者有利的时间和机会而定。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周期性迟早会形成地球规模的共振，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今后倍加关注的热点。

网络成为动乱的温床

网民之间的直接对立是一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也一定意义上脱离了政治（体制），有可能引导社会朝新的方向发展？这类自乱自娱的侧面还有可能会减轻对体制的压力。

网络的腐蚀性具有强烈的瓦解社会结构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

秩序解构力量。一直以来美国借助网络这一利器展开对其他国家的攻击，但是最近自己却不得不面临这一力量的反噬。

与CIA密切相连的美国香港总领事馆，美国以及台湾的民主主义基金会大概率深深地介入了2019年香港动乱，作此猜测是合理的。对充斥着大量强硬反华政客的川普政权以及更加重视意识形态，不掩饰自己对香港动乱的关切的美国国会，尤其是长期以来在寻找机会针对中国下手的CIA来讲，香港动乱是天赐良机。

普京的复仇

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复杂起来了。有些国家，比如普京的俄罗斯，不愿意单方面的受制于人，开始主动出击，结果2016年就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其他如北朝鲜和伊朗也都被指有类似倾向。这三个国家的共同之处是已经对改善关系不抱希望。

中国还没到这一步，但是如果来自美国的压力一直高居不下的话，中国也不会坐等甘于寂寞的。重要的是，中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比俄罗斯等国抗拒外来压力的能力要大得多。美国在一些国家很灵的那些招数对中国无法收到有效的成果。中国似乎已经对大部分的外来压力都已经形成了免疫能力。中国的逐步强大有利于从这道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维持跟美国之间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其实，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也只是通过代理人之间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战争，两国之间的直接大战一次也没发生。中国也逐渐看穿了问题的实质，“好也好不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最近成了中国领导人在内部会上的口头禅。

对美国不利的是，中国的强大化和强硬化更具示范效果，对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会产生波及效果。因为实际上这一过程是缓慢进行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几次较量中，美国不仅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应该说是受内伤较深的一方。

最后的机会：日高义树的“华盛顿报告”

美国早就想对中国下手了，但是美国运气不佳，人算不如天算，每次都到关键时刻被拖了后腿，每次都半途而废。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川普政权，这次碰上了新冠病毒。不得不做罢了。

20年前日美右派就持有同样的不安，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感到再

这样放任中国发展下去的话,会永远后悔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机会”.美国的右派们或许认为,或许是最后的机会,因此希望一鼓作气,自伤八千也要杀敌一万.但这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已非昔比,美国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1990年代后半,日本富士电视台有一个很受右派欢迎的节目叫做“华盛顿报告”,由时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的日高义树主持,高调吹响向中国进军的号角.采访美国的各大保守论客,美军的战略战备部署.煞有其事,似乎美军已经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对中国开战了.美国的盟国,合围中国包围中国.富士电视台是日本的保守右派电视台.

但实际上美国一次也没能够真正跟中国打起来.看来每次评价都得不到政治经济上性价比上的利益,更得不到军事上必胜的结论.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这种合理性应该说越来越减弱,甚至可以说是消失殆尽了.美国愿意为了日本的右派们跟中国打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吗?中国已经在军事上成长为另一个俄罗斯,而且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世界上的影响力等多方面都远比俄罗斯更大,更加难以对付.

笔者个人以为,虽然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但是直接的军事对决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选项了.川普政权把对中国的“立技”用到了极限,今后很难再出同等程度的大招了.民主党政权更倾向于使用“寝技”,这或许比“立技”有实效,但是中国不惧此类攻击,因为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比美国更善于处理天灾人祸等突发局势,中国等得起.经过川普这四年的折腾,拜登联合国共同对付中国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套组合拳恐怕要成为花拳绣腿了.

时至今日,能够达到中国的恐怕只有中国自己了.只要中国自己不作死,谁也无法打死她.既打不死,一般的攻击只会令其更加强大.美国现在最明智的战略应该是放弃达到中国之类不可能的战略企图,跟中国之间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这样可以保存体力,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就跟中国持久地和平共处.这是受损最小的战略,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奶茶联盟”所显示的新的方向性

最近还有所谓的“奶茶联盟”的说法,港台泰菲四地的青年学生串联交流反政府经验.本质上跟文革时期的串联类似,形式却是因特网时代的新鲜事物.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四地串到一起的因缘.港台学生串在一起还好懂,毕

竟台湾也曾发生过以大陆为对象的“太阳花事件”，此后又一直致力于把动乱往香港扩散，而且这次台湾也下本钱为香港学生撑腰。泰国学生反对的是腐朽的王政，中国政府虽然不好干涉别国内政，但一来自身早就彻底废除了封建王权，而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跟王权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中国关系密切的他信前首相以及他的政治势力（红衫军？）也是反王政的。至于菲律宾就更加看不懂了。

- (1) 有一定的传染性。年轻化和现代化·虚拟化。
- (2) 我们能够观察到各国之间年轻人的合作。日美港台+泰马等东南亚。
- (3) 尽管受了一定的引导，但是目前似乎方向性不强。不过，被制造出来的一面也不可忽视。今后首先是在中国的周边，如港台+泰马会传来传去，或者又传回来。
- (4) 并非中国独具的特征。而且，虽然也有周期性，但不像在中国那样是一个10年的周期。10年可能是中国的个性，其形成有多种因素的共振同幅。在各国这个周期恐怕要短得多。有可能出现第一波，第二波的现象。
- (5) 后面的操纵家，玩家的存在。像最近被逮捕的班农之类就是这样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在世界上到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出逃商人郭文贵与之沆瀣一气，造谣生非。在国外，这类反华势力最近有同流合污的趋势，汇聚成一股浊流。不过是聚散离合的一部分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中国的问题永远首先都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上海5国组织对抗。
- (6) 正在漂洋过海，下一次在美国什么地方爆发也未可知。美国极具未来性，可能性大大的。其极度割裂的国内社会已成动乱的温床。大选就有可能提供这方面的契机。传统上，党派政治上的驴象之争，地域政治上的蓝红之争，种族政治上的黑白之争，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这些都因为最近川普不择手段的竞选策略而越演越烈，复杂化的同时更加激烈。
- (7) 川普的民粹政治的失政，导致新冠病毒的爆发式传染。美国已经失去了对抗新冠病毒的自信。剩下来的只有把矛头引向国外，中国首当其冲。
- (8) 有必要将计就计跟美国保持适当的国际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 (9) 一旦各国的年轻人联合起来（目前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内在的关联），香港的运动将获得新的合法性，主要是从泰国反王政运动获得这种助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完全可以容忍这种不同而实现一种表面的联系。
- (10) 年轻人的背后有各国政府的存在。在中美争霸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周边地区今后都难以安宁。东南亚首当其冲。

新的方向性使得运动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奶茶联盟”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或许代表了当代社会动乱的一个新动向：行动的过激性跟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的不平衡。文革时的知识青年也出现过类似的虚无主义倾向，但主要是文革后期。这次香港学生运动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传统学潮的严肃性。这可能跟虚拟环境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跟以往的学潮·社会动乱不同，这次香港学潮显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代际裂痕也非常明显。尤其是跟内地网民之间的隔空对骂是一大特色。这还可以视为孔祥东咒骂香港人的一个延续？至少作为一个侧面。

川普治下美国软实力的崩溃

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其实是在挖美国自己的墙角。一方面是破坏世人对美国的信赖从而减弱美国的软实力，特朗普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行为，已经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跌入谷底。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是美国主导设立的，长期以来也是在美国的支持和主导下运营的。各大组织没有美国的参与依旧可以正常运转，可是美国的很多行为在离开国际组织以后，很可能今后会变得软弱无力，达不到设立的目的。但是，美国离开以后孤家寡人，也不是个办法。至于另起炉灶？恐怕只会跟原来的组织对立，这种公然的分裂行径，能够得到什么支持吗？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川普任内使美国的国际声誉大大受损，后任政权如果不能亡羊补牢，美国将会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孤立。自绝于世界各国？

美国的世界霸权为美国带来了无比强大的实力，川普治下的美国的确可以据此逞强于一时，但却难以永远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孤立和限制美国企业的发展从而直接断送美国的前程。美国虽强，但也不能包打天下，美国也只是全球生态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美国下任领导者应该审时度势，做识时务的俊杰。

美国多少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收留动乱分子，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动乱因素。这使美国成为藏污纳垢之所，一个身具百毒的毒王。但美国看似百毒不侵，实际上一直是用强健的体魄压制住了这些毒素。一旦体质下降毒素就会反噬，百毒齐发，会很要命的。2020年这次大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轮功台独等等，川普以及一部分共和党上层深受阴谋论的毒害。众多的信宗教，跟台湾蔡英文以及港独合流，他们在CIA的资助下在因特网上兴风作浪，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失去了自信，不敢公平竞争，就想来粗的和横的。从前嘴上一直说得那么漂亮，现在却180度转了弯，同样也不可能成功的。从前美国杀鸡给猴看，可是现在中国成了猴，杀不了，杀了鸡也看不懂。没有效果。

川普政权用这种方式是杀不死中国的，只会使其更加强大和对美国抱有敌忾之心。网络是一柄双刃剑，过去美国一直持其为攻击别国的利器，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反受其害。